

从“合作原则”看清末民初日本东北方言 会话课本语料价值

岳 辉¹ 李 逊²

[摘 要] 在当前的汉语方言研究热潮中,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探讨的却较少,而日本明治时期编写的一系列东北方言教科书则是我们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通俗满洲会话》等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研究,我们形成了对明治时期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会话用特点的基本认识。这些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既可以为现在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编撰提供样式参考,又可以使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语用“合作规则”研究有的放矢。同时,为揭示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的会话语用面貌提供一种新的探索思路。

[关键词] 合作原则;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日本汉语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13-07

[收稿日期] 2015-08-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78。

[作者简介] 1. 岳辉,女,吉林大学国际语言学院教授,院长,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史(长春 130012);2. 李逊,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吉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汉语教育史及东北方言历史接触研究。(厦门 361005)

在当前的汉语方言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对东北方言的关注并不少见,但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的探讨者却寥寥无几,偶尔有学者涉及,但仍然感到十分不足。比如李光杰、李无未《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以〈东北鼓儿词选〉张注为例》、邹德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等论文虽颇具新意,但仍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们认为,系统的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研究尚未展开,主要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研究论著还没有见到,这确实是个缺憾。

毫无疑问,现代东北方言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我们选取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的“合作原则”作为一个切入点,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一、日本明治东北方言课本《通俗满洲会话》

清末民初,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东北大好河山垂涎三尺,总是希望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东北(满洲)。为了日后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需要,日本一些语言学者和军部高层编撰了一系列东北方言教科书,目的是让日本军人尽快掌握东北本地的土语,以实现其顺利占据、统治东北的企图。从对外汉语教科书编写角度来看,这些教科书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并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鲜活的东北方言实际。已经有学者认定,这些教科书是珍贵的研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的语料,应该予以重视。我们研究近现代东北方言演变的历史,就应该以这些珍贵的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教科书为基本依据。

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有如下三本日本明治时期东北方言教科书:

1.《满洲语会话一个月毕业》,书中没有明说作者,但据其《序》,很可能是石冢猪男藏。作者作为日军的随军翻译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又来到了东北。石冢书店,1904年5月出版。

其体例:先是本书的“说明”,正文80页。第一编,词语类;第二编,散语类;第三编,问答类。无论是词语还是问答、会话都有相应的日语对译。

其编写缘起:依据他个人的调查,编写“应用日常必需”的会话书。汉字语音标记,体现由官话“本音”而理解“土音”的原则。^{[1][2]}

2.《通俗满洲会话》,熊谷茂之助编,东文舍,1908年4月出版。

其体例:正文101页。一是“凡例”,强调作者编写的意图;二是正文,包括“散语”、“买东西”、“旅行”等内容。

其编写缘起:作者认为,日本人一般了解的主要是北京官话,但对满洲土语,即东北官话所知甚少。希望通过这本书,从语音和语法两方面入手,对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进行对比而掌握基本信息。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其编写意图,但是根据其书内容来看,并非出于纯研究的目的,教学受众主要为日本侨民和驻满日军。^{[2][2]}

3.《袖珍满韩土语案内》,其作者为陆军步兵大尉平山治久,博文馆,1904年出版。分为前后两篇:前篇介绍满洲土语,后篇介绍朝鲜语。其中前篇14节,49页;后篇13节,61页。其每节基本结构为先介绍生词,再根据每节所学生词来组成一段或几段短小的对话。

其编写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使日军士兵尽快掌握满洲土语与朝鲜语,以便日军可以顺利地在朝鲜和满洲两地进行一系列军事侵略活动。所以其选词基本为军事行动服务,具有鲜明的军事目的性。^{[3][3]}

我们以《通俗满洲会话》为主要分析对象,兼而涉及另外两本东北官话教科书文献。

二、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模式研究理论基础

清末民初日本语言学者和日本军部高层官

员编撰这一系列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使日本军队以及日本侨民在中国东北站稳脚跟,以实现日本长期侵略中国、占领东北的意图。具体来说,即使日本侨民和军队可以通过掌握东北方言来实现日常生活交际以及顺利完成军情侦查、行军、采购物品等军事任务。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即是日本侨民和军队希望通过学习东北方言,更好地与当地居民进行有效“交际”。因此,在编撰教科书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所选东北方言词句的实用性和准确性以外,还必须要考虑如何使交际能够更加顺畅,更为成功。所以,在这些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也要考虑到日军和日本侨民在参与和中国东北居民交谈时,如何根据其所参与交谈的目的或对象的变化而提供适切的东北方言话语信息,即如何更好地遵守谈话交际的“合作原则”。虽然《通俗满洲会话》编撰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格赖斯“合作原则”理论,但是其作者在编撰《通俗满洲会话》时也潜移默化、一定程度地运用了“合作原则”与基本“形制”规则,从实践上遵循了“合作原则”的一些基本规范。

合作原则,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以《逻辑与会话》为议题演讲时率先提出的。什么是合作原则?一般来说就是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对话双方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某一原则,以求有效地配合,从而完成交际任务。格莱斯认为,人们在谈话过程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又包括一些准则和次准则:其一,量的准则。包括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其二,质的准则。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其三,关系准则。说话要与“主题”有关联。其四,方式准则。说话要清楚、明了,避免晦涩,避免歧义,简练,井井有条。而人后通过研究,又补充了第五条原则,即“态度准则”。态度准则是:努力使你说的话充满友好,善意,富有艺术性。要礼貌、要幽默、要委婉。^{[4][2]}

以下我们根据语用实际,运用“合作原则”理论分析《通俗满洲会话》等教科书的会话模式,以判断其对研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面貌的语料价值和意义。

三、《通俗满洲会话》中的“合作原则”

(一)《通俗满洲会话》中的“量的原则”

格赖斯“量的原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 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2. 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通俗满洲会话》作者在“凡例”中强调,其编写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本书,从语音和语法两方面入手,通过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对比而掌握基本会话模式。而我们认为其编写受众为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撰写这本教科书的根本目的就有两个:第一是驻满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能够更顺畅地与当地居民进行日常交流;第二则是让驻满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能够通过本书了解北京官话和满洲土语的区别,能够更好地跟操北京官话和满洲土语的中国人进行交流。本书的信息量足够达到这两个目的,即满足了“量的原则”的第一条“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而如果本书的会话模式信息皆是以上两个目的服务,那么就满足了“量的原则”的第二条“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以此为评判标准,我们来分析一下《通俗满洲会话》会话模式是否符合“量的原则”。

从宏观上看,中国人认为日常生活应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经过整理发现,其中直接涉及到“衣”,即关于穿衣着装、梳妆打扮方面的有以下语句,一共 14 句,占有所有语句的 2%。

这个衣裳(p4)、那个帽子(p4)、那么鞋(p4)、那么靴子(p4)、下雪借给你蓑衣(p18)、今儿早起装清国衣裳(p36)、清国人都打辫子(p40)、外国人都绞头发(p40)、这个裤子太瘦挤得慌还要肥点的(p47)、我明年要留辫子装清国衣裳带清国帽子(p51)、这靴子大点儿还要小点儿(p63)、你穿这一双(p64)、用这个绵羊皮做一个坎袖儿(p65)、量量尺寸(p46)

其中直接涉及到“食”,即与吃喝、食物有关的有以下语句,一共 49 句,占有所有语句的 6.6%。

七斤酒(p2)、不好肉(p2)、好吃不好吃(p5)、吃饭了么(p18)、我还没吃饭(p19)、我饿了(p19)、饭还没得么(p19)、太多吃不了

(p19)、你爱吃日本菜不爱(p24)、我还没吃过(p24)、喝茶水(p27)、这个茶叶子是日本的是清国的(p27)、拿点糕子来(p28)、我爱吃糟子糕(p28)、酒钱(p30)、我吃完饭了就来(p43)、你也吃饭今儿有好菜(p43)、他的酒量大不大(p43)、他是海量(p43)、快烫酒来(p44)、多喝几盅(p44)、还不能喝(p44)、我原来不会喝(p44)、不会喝酒不会抽烟我在里(p44)、豆腐(p54)、晌饭的时候要炒肉丝炒肉片鸡蛋烤子(p54)、有什么凉菜么(p54)、这个白面不大好要洋面(p54)、韭菜蒜菜都有(p54)、吃饱了我困了(p54)、这个地豆子通通有多大分量(p59)、你们这都有什么肉(p59)、猪肉牛肉驴肉马肉都有(p59)、邀十斤猪肉(p60)、我要吃晚饭你去买蘑菇木耳虾米海参来(p60)、做什么菜(p60)、要做一个炒肉片一个凉菜(p60)、打点酒来(p61)、打什么酒(p61)、烧酒太冲不能喝打烧酒来(p61)、这俩小鸡子卖给我(p61)、不卖母鸡送给你公鸡不要钱(p61)、那么我买鸡子儿(p62)、你买来的这个猪肉竟是肥的没有瘦的换换来(p69)、小豆怎卖一斗(p74)、豌豆豆角大豆什么的(p75)、打洋油来(p75)、卖什么鱼(p77)、鲤鱼鲫鱼鲶鱼没别的(p77)

其中涉及到“住”“行”,即与出行、旅行、外出有关的有以下语句:

两匹马(p2)、三辆车(p2)、十里路(p3)、你去过么(p6)、快快的回来(p7)、来了(p7)、到了(p7)、他什么时候儿回来(p8)、你上哪儿去(p8)、我上街(p8)、今儿晚来(p10)、我明天(明儿)再来(p10)、来不来(p11)、来没来(p11)、我明天还来(p14)、这几天上哪去来(p14)、上沈阳去了(p15)、快走我怕赶不上(p20)、你们都来齐了么(p21)、有还没来的(p21)、叫他们来(p21)、出门了(p24)、马还没来吗(p30)、快备马(p30)、快套车(p31)、冬月回来腊月回来不一定(p34)、他们来过(p36)、他们往那边走了(p36)、往北边去了(p37)、回来我就接他去(p47)、到那儿下车(p47)、你这里打哪儿来(p70)、我是从城里来(p70)、你上那儿做什么去了(p70)

一共 35 句,再加上“旅行”部分的所有语句 151 句,一共 186 句,占总数的 25%。

由以上数据可知,有 33% 的语句是和“衣食

住行”这些日常生活的基本用语直接相关的。而《通俗满洲会话》正文的三大部分“散语”、“买物”、“旅行”中的其他语句,也或多或少的与日常生活基本相关,能够充分体现当时居民日常使用的东北方言基本面貌。一个在东北旅居的日本人如果将其学习透彻,则基本能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交际任务。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符合了“量的原则”的第一条:“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量的原则”的第二条“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我们认为,《通俗满洲会话》满足了这个条件。《通俗满洲会话》中所涉及的词汇与句子大多与日常生活有关,而对于驻满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来说,除了极特殊的军事行动和情报特务工作,其交际的目的仍然限定在因日常生活之事而进行的交际上,《通俗满洲会话》所包含的信息量与编书的这两大目的息息相关。所以说,《通俗满洲会话》符合“量的原则”的第二条“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按照《通俗满洲会话》学习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在交际过程中不会因为会话模式信息量不足而违反“量的原则”而导致不成功的交际,作为反映当时东北方言基本面貌的语料,《满语会话》是合格的。

(二)《通俗满洲会话》中的“质的原则”

格赖斯“质的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 不要说自知为虚假的话;2.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从宏观上讲,由于我们知道《通俗满洲会话》编写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在东北地区能够更顺畅地进行日常生活交流并能够辨别北京官话和东北方言,其内容多是日常生活用语。我认为作者编书的出发点就符合了“质的原则”。

首先,“质的原则”的第一条“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我们进行换位思考,如果一个日本侨民在与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聊天,而这个日本侨民却只懂日语和北京官话,那么无论他说什么,对方都不会明白,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信息量再大,这种交际也无法成功。那么,明知对方不明白却仍要坚持用对方不懂的语言交流,虽然

在内容上符合“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但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和违背“质的原则”第一条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无法完成交际。这种违反原则虽然不是在内容上,但却是在语言形式上,作者希望通过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使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避免因语言不通而违反这种原则。

而“质的原则”第二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也是作者希望读者达到的境界,因为当发起交际的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对方了解自己的母语时,却因为不懂对方的母语而被迫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交际时,虽然其内容可能符合“质的原则”的第二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但是在对方来看,尽管它依然缺乏足够的证据令人信服。反之,面对别人首先用自己不懂的语言进行的交际,因为自己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那么无论回答什么都是“缺乏足够证据”。

《通俗满洲会话》的作者希望通过编写这本教科书,来避免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由于语言不通而导致违反“质的原则”,尤其是注意了同一种语言中官话与方言的区别,这是我们现在编写对外汉语教科书所应该借鉴的。

综上所述,《通俗满洲会话》满足了“质的原则”。作为语料,能够真实反映当时东北方言的基本面貌。

(三)《通俗满洲会话》中的“关系原则”

格赖斯的“关系原则”,即说话要与“主题”有关联,即如果想进行一次成功的交际,交际的双方需要围绕同一话题进行交际,交际的内容要切合题旨。那么,在交际的过程中,题旨就显得至关重要。

《通俗满洲会话》作者在编写之时,已经为读者提供了题旨,即“散语、旅行、买物”三大方面,书中所提供的语句都是围绕这三大方面展开的。其中“散语”介绍了日常生活所必须了解的一些基本用语,包括数字与量词,例如“一个人,两匹马,三辆车”(P2);天气方面,例如“天道冷”(P3),“热不热”(P4);日常交际,例如:“你姓什么,贵姓”(P8)“多谢多谢,不对谢”(P25)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琐碎用语。而“旅行”一篇则偏重于介绍关于出行的一些语句和在旅行中会用到的日常用语,例如“道、河、山、屯子”(P78)等地理用语,“铁道、船、火车”

(p79)等交通工具,“有多少里、有多远儿”(p80)、“离这儿多远哪”(p85)等问路语句以及涉及外出旅行的其他方面的琐碎用语。“买物”一篇顾名思义,着重介绍了关于买卖的日常用语,例如“多儿钱?多少钱?怎卖?”(第55页)等问价用语、“多少斤?多大分量?”(p56)等询问斤两用语、“让点儿、少筹哪”(p57)等讲价用语以及一些购买具体东西会用到的具体用语。

“散语、旅行、买物”三篇基本涉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足以满足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在东北地区与当地居民进行日常生活交际的需要,尤其是一些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语句,如“上沈阳去了”(p5)、“快拾掇拾掇”(p17)、“别磨棱子”(p21)、“我爱吃糟子糕”(p28)等都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助于日本侨民和日本军队与当地居民在交际中发生关联。

其中,具有明显东北方言特色的有以下语句,我们根据语言要素情况进行了以下分类:

1. 具有东北官话语音特点的:

多(duo2) 嗜(zan) 回国(p7)、快拾辮(shi2dao) 拾辮(p17)、那个搁(gao1) 这儿这个搁(gao1) 那儿(p17)、我爱吃糟(cao2) 子糕(p28)、每夜里打勤(同“更”jing1)(p34)、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疙(ga1) 瘩(p41)、这个烟太冲(chong4) 我要薄一点的(p44)、别抽大烟抽大烟的都是脸面刷(sa1) 白(p44)、落不了色(sai3) 么(p48)、把这个被物(应写作被褥,读作 bei4wu,读成零声母) 晒一晒晒干了就拿来(p53)、邀一邀(应写作约一约,但是读音和“邀 yao1”一样)(p56)、他们来遭(zao4) 害人不遭(zao4) 害人(p86)

2. 使用东北官话方言词汇的:

天道冷(p3)、不大离儿(p7)、没准儿时候儿(p8)、今儿街上热闹(p9)、后儿个(后天) 要三个苦力(p10)、有什么口当(p12)、明儿早起来(p12)、竟(同“净”) 小的没有大的(p20)、那儿有溜子么(p22)、一点风丝儿也没有(p28)、还短几个(p29)、添俩(p29)、你会较头发么(p39)、老爷(太阳日头) 出来快起来罢(p42)、他是赶伙计(苦大力)(p43)、我大后儿个一定回来(p49)、晌饭的时候要炒肉丝炒肉片鸡蛋烤子(p54)、这些个地豆子通通有多大分量(p59)、别

短份量(p59)、也有捻把上弦的也有用钥匙上弦的(p64)、用这个绵羊皮做一个坎袖儿(p65)、我看那个劈材没干都湿的分量大(p72)、赶车的(劳辫子)(p80)、红胡子(p80)

3. 使用具有东北官话方言特点的地理词汇的:

其中,屯子(堡子)(p78)等词汇为东北方言特色的地理词汇。除了具有东北方言特色的地理词汇,《通俗满洲会话》还收录了一些东北的具体地名:

上沈阳去了(p15)、我说是上杨家屯那边走(p81)、这儿到吉林还多远儿(p82)、上吉林走这个道儿么?(p82) 上宽城子坐火车几天能到(p83)、往大连去的火车开了没有?(p91) 你去买到大连的火车票来(p93)、打到营口(p95)、上宽城子有抄近的道儿么?(p96) 顺着那个山往前走就到李家堡(p96)、大孤山那么看(p99)

通过以上信息分析可以知道,在《通俗满洲会话》中收录了大量当时的东北土话,其中老爷(太阳日头) 出来快起来罢(p42)、红胡子(p80)等语句很有当时的地方特色,并且已不再在现代的东北方言中使用这些语句。而屯子(堡子)(p78)、他们来遭害人不遭害人(p86)等语句,让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方言历史演变过程中词汇的“替换”和存留规律,这也是我们研究东北方言演变史时所需要的材料。

同时,《通俗满洲会话》也收录了很多带有当时口语色彩的词汇,让我们对当时东北地区日常生活中使用口语的情况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譬如:

中不中(p3)、顶好(p4)、给我你的片子(p9)、我给你开个字(p13)、我要的时候儿给你信儿(p14)、别磨棱子(p21)、这个日本刀顶快(p34)、这个裤子太瘦挤得慌还要肥点的(p47)、多儿钱(p55)、你看多儿钱(p57)、别谎价儿了(p58)、你这是打哪儿来(p70)、不中啊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p71)、顶结实(p76)、不远儿打这儿往东就到(p85)、走岔儿了道儿了(p85)、上宽城子有抄近的道么?(p96)、打这个小道儿走近点儿(p96)、打别处绕不过去么(p96)

从语用角度看,《通俗满洲会话》的内容设置切合题旨,而其题旨的设置也能很好地与日本侨民和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生活交际发生关

联 符合“关系原则”。

(四)《通俗满洲会话》中的“方式准则”

格赖斯的“方式准则”要求在交际中说话要清楚、明了,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1. 避免晦涩;2. 避免歧义;3. 简练;4. 井井有条。

在《通俗满洲会话》中,由于中介语的存在而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其中有些词句比较晦涩难懂(例如:不对谢(p25));有些不够简练,比较啰嗦(例如:我有托你的一件事(p12));

有些词句语法比较混乱(例如:他坏了我的表(p26))。但是,在《通俗满洲会话》一书中,大多数的语句不晦涩、无歧义、简洁而井井有条,不但满足了日本侨民在东北生活的基本交际需求,也证明《通俗满洲会话》是可以信任的东北方言史语料。

通过分析其违反“方式准则”的语句,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编者根据日语的语法来套用汉语的语法,导致语句违反“方式准则”。日语的语序多为“主语+宾语+谓语”,而《满语会话》中的一些语句也是以此种方式排列的,例如“你跟我拿过来(p67)”、“他昨晚叫有个贼给杀了(p46)”、“我说是上杨屯那么走(p81)”等情况。二是编者将口语翻译成书面语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错别字“若是耽误工夫我法你(p22)”、“你去给我借一个桌子来(p18)”、“不会喝酒不会抽烟我在里(p44)”;口语翻译成书面语后可以明白意思,但是语法错误,如“你是特意这件事来的(p47)”、“我说是上杨屯那么走(p81)”等情况。以上两种情况出现较少,并不影响其为珍贵东北方言史语料的价值。

(五)《通俗满洲会话》中的“态度准则”

格赖斯的“态度准则”包含以下内容:努力使你的话友好、善意、有艺术性。通过调查分析,在《通俗满洲会话》中涉及、体现礼貌及礼貌用语有以下语句:

贵姓(p8)、多谢多谢(p25)、不对谢(p25)、这个枪上一回打仗的时候儿日本大人送给我的(p35)、他的媳妇顶美貌(p50)、谢谢你的盛情(p75)。一共6句,占总数的0.6%。

而《通俗满洲会话》中不礼貌的有以下语

句:

一点规矩也没有(p17)、他说的话都是靠不住(p20)、操你妈(p42)。一共3句,占总数的0.6%。

由此可知,《满语会话》中没有涉及太多礼貌用语,反而有几句并不讲求礼貌或不礼貌的用语。我们知道,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敬语,根据语言的迁移理论,日本人编撰的东北方言教科书应该比较重视礼貌用语的介入,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很有可能是因为存在两个情况:一是当时的东北方言当中的确没有使用更多的“贵族式”礼貌用语。因为当时的东北人口并不多,且大多是当地的“坐地户”和由山东等地闯关东移民到东北的居民,而北方人性格豪爽,在会话中并不过多强调礼貌含义,如果过分过多强调,反而会被认为是“礼貌过度”,会被理解为一种态度冷淡和距离感的表现。所以,《通俗满洲会话》中并未过多涉及礼貌用语,是一种切合当地会话实际的语言方式。二是编者将《通俗满洲会话》作为一本初级东北方言教科书来编撰,就很难有机会涉及较高层次礼貌用语的使用问题。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敬语词汇作为日语的基础词汇之一,也存在于初级语言教学范畴中。同样在汉语中,礼貌用语也并不是高级阶段才会使用的词汇,例如“请”、“请问”、“您”等词汇都是汉语学习中基础的基础,所以,无论是从日语还是汉语“礼貌用语”教学的角度,礼貌用语都是简单易学的基础词汇。本书没有充分考虑礼貌用语使用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幽默是一种高级的语言技巧。作者编撰《通俗满洲会话》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东北侨民基础的生活交际需求,而幽默则是一种超越普通生活交际技巧的高级语言技巧,《通俗满洲会话》语言会话意在表达平实准确,而不在于幽默与否,因此,未收录幽默语句则可以理解。

四、《通俗满洲会话》对编撰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的启示

《通俗满洲会话》不但是对比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课本,更是一本以汉族基本生活交际为教学重点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其内容大概相当于现代汉语HSK考试三级的水平^{[5][2]}。在当前全球盛行“汉语热”的情况下,各种各样

的对外汉语教科书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面上,编者大多是华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俗满语会话》作为一本清末民初时期日本人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也能为我们将来编撰对外汉语教科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编撰《满语会话》的主要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满足日常会话的交际行为模式,而且书中的会话词句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收集。当前出版的一些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目的性十分模糊,并未明确指出会话教科书针对的课程设置是为了满足什么样的目标需求,有想学习商务汉语会话的学生却学到了HSK考试会话教材,想学习一般汉语会话而来中国留学的学生却学到了商务汉语会话。所以,编撰未来的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过程中,要更加明确会话教科书所针对的受众和会话教学目的,使学生和老师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更加明确选择合适的会话教科书。

同时,我们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存在多种方言,而且,其中很多方言与中国官方语言普通话相差甚远,那么,为了满足外国人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生活需要,编撰汉语方言教科书势在必行。虽然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发行过一些粤语、闽南话的教科书,但是数量很少,质量也没有保证。而《通俗满洲会话》虽然编撰于100多年前,但无疑是一本典型的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它所蕴含的一些教学理念可以为我们编写汉语方言教科书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

我们在编撰教材和教学的过程中,要关注汉语与学习者母语之间的“正迁移”和“负迁移”问题。《满语会话》中出现了一部分会话的语法错误,是因为作者的母语日语语序和所学习的对象语言汉语语序的不同而造成的,这种错误也是汉语学习者常犯的的错误,即母语和汉语之间的“负迁移”。

五、结语

通过研究清末民初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我们的考虑是:1. 它可以使我们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基本认识。2. 通过分析

《通俗满洲会话》,为编撰现在对外汉语会话教科书提供参考。3. 可以对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中“合作规则”有一个明确的认识。4. 可以揭示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模式“言语行为”的实现途径。5. 为东北方言会话的历史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探索思路。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从海外视角由东北方言会话教科书资料入手进行研究。所以,这一系列清末民初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提供了珍贵的语料,而通过本文的分析,也证明《满语会话》的确能够反映当时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会话的基本面貌。

从清末民初东北方言到现代的东北方言,在这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除了东北方言自身所遵循一定的变迁轨迹之外,一定也受到了语言外部要素,比如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促使东北方言的“语言接触”不断加速。《满语会话》等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文献的发掘打开了通向外部汉语教科书文献世界的大门。不仅是在日本汉语教科书中可以发现东北方言教科书文献,我们相信,在俄罗斯等国家等历史文献中还会发现东北方言教科书文献。在世界愈来愈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学者的努力下,随着更多的世界范围内东北方言文献资料得到发掘,东北方言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一定会愈加清晰起来。

参考文献:

[1][日]石冢猪男藏《满洲语会话一个月毕业》,石冢书店,1904年。

[2]熊谷茂之助《通俗满洲会话》,东文舍,1908年。

[3]平山治久《袖珍满韩土语案内》,博文馆,1904年。

[4]金立《合作与会话——合作原则及其应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5]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 丛光]